

教育生态学视角下 中高职贯通培养机制的系统建构与优化路径

朱长江,陈 鹏

(江苏师范大学 教育科学学院,徐州 221116)

【摘 要】中高职贯通培养机制旨在构建一个具有自组织、自适应特征的职业教育生态共同体,以实现教育与产业的深度融合,培养适应社会经济发展需求的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然而,当前中高职贯通培养面临课程衔接断层、资源分配梯度差、社会认知偏差、产业适配滞后等问题,严重影响了职业教育的质量和效益。文章从宏观和微观两个维度分析了中高职贯通培养体系的构成要素及其相互关系,并从生态链修复、资源势能配置、提高项目认可度以及更新产教融合迭代机制四个方面提出了中高职贯通培养项目生态平衡优化路径。中高职贯通机制的构建和发展需要突破原有的生态壁垒,构建教育生态系统演化模型,推动职业教育从“规模扩张”向“质量共生”的生态转型。同时,实现教育生态与产业生态的协同进化,为社会经济发展培养更多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

【关键词】中高职贯通培养;教育生态学;教育生态链;职业教育

【中图分类号】 G710

【文章编号】 2096-6555(2025)03-0038-011

【文献标识码】 A

【DOI】 10.19796/j.cnki.2096-6555.2025.03.005

【作者简介】朱长江(1999—),男,江苏连云港人,江苏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硕士研究生;陈鹏(1982—),男,山东单县人,江苏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教授,博士。

一、引 言

国家对职业教育日益重视,其社会认可度不断提升,相关工作稳步推进。2022年4月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施行,明确职业教育是与普通教育具有同等重要地位的教育类型,职校生在升学、就业职业发展等方面有平等机会,这标志着职业教育作为类型教育的时代来临,不再是“断头”教育,职校生也能实现“升学梦”。2024年10月发布的《2023年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中等职业教育招生454.04万人,高职(专科)招生555.07万人,五年制高职转入专科招生60.70万人。^[1]这些数据表明职业教育在招生规模和人才培养上取得显著进展,为社会输送了大量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推动了我国职业教育体系的完善和发展。

中等职业教育和高等职业教育作为我国职

业教育体系的两大重要部分,在培养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方面贡献突出。然而,中高职贯通培养项目的政策推进虽有进展,但仍面临诸多挑战。例如,国家虽大力支持,但缺乏统一指导文件,导致“硬衔接”“假贯通”现象频出,与企业岗位需求差距大。^[2]教育行政部门统筹不足,中高职合作多限于优质校际一对一,且高职院校积极性不高。^[3]课程体系和教学内容不衔接,无统一课程标准和教材,教学“各自为政”,内容重复、断层、错位。部分高职院校合作姿态高,实质性合作少,协同育人难。^[4]评价方式缺乏科学性,现有评价机制不能全面反映学生素质 and 创新能力,学生学习“应试化”严重,学生实践能力弱。^[5]这些问题影响中高职贯通人才培养质量,也导致大众对职业教育的刻板印象难消除,中高职贯通培养项目仍被视为“低人一等”的选择。因此,未来中高职贯通培养项目的实

施需从政策、课程、校企合作、评价机制等多方面入手,推动其从形式一体化向内涵一体化转型,实现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如何推动中高职贯通更好地发展,以及如何改善社会关于“上职校就是差学生”的刻板印象,是笔者一直在思考与探索的问题。

基于对已有文献的梳理,发现推动中高职贯通更好发展,绝不能仅仅依靠外部力量,而是要激发中高职贯通体系的内部力量。目前对于中高职贯通培养的研究较微观,且实证研究相对匮乏。虽然微观领域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但学者对于中高职贯通培养的研究始终局限于各要素之间表层的关系。涂尔干在《教育思想的演进》中指出:“无论在什么时代,教育的器官都密切联系着社会体中的其他制度、习俗和信仰,以及重大的思想运动。”^[6]潘懋元先生也曾提到:“高等教育需要多学科的支持,从多学科、多视角进行审视和探索,才能比较全面和深入地理解高等教育的本质、功能、价值,掌握高等教育的内外关系规律。”^[7]

中高职贯通体系的优化不仅需要政策支持和制度保障,还需要从多学科视角进行深入研究 and 实践探索。因此,中高职贯通体系的研究仍有较大的拓展空间。本研究希望通过对中高职贯通体系的优化,能够推动中高职贯通发展以及职业教育的整体进步,为社会培养更多的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

二、中高职贯通培养项目的教育生态学解析

教育生态学这一概念于1976年由美国教育家劳伦斯·克雷明首次提出,提倡运用生态学的系统观、联系观、平衡观、动态观来考察教育问题。^[8]教育生态学以系统、联系、动态和平衡的观点考察教育场域中的问题,其核心观念是可持续发展。本研究基于教育生态学视角,将中高职贯通体系看作一个生态系统,利用教育生态学的理论审视贯通体系,描绘出中高职贯通体系的应然图景,并以应然图景为参照,洞察目前中高职贯通体系所存在的不足之处,并借助

教育生态学的原理、思想和方法为构建生态化的中高职贯通体系提供有效指导。教育生态学强调教育系统是一个复杂的生态系统,其运行和发展依赖于系统内部各要素的相互作用和协同运作。^[9]系统整体性和生态因子协同是教育生态学的两个核心视角,分别从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揭示教育系统的运行机制。^[10]其中,系统整体性维度关注教育系统的整体结构和功能,强调系统内部各要素(如中职与高职教育)之间的协同性和一致性;生态因子协同维度关注教育系统内部各生态因子(如学校、企业、政府、师生等相关主体)之间的动态关系和协同作用。中高职贯通教育涉及多层次、多主体的协作,其复杂性决定了需要从不同维度进行分析。系统整体性维度强调中高职贯通教育需要在人才培养目标、课程设置和资源配置等方面形成整体性。通过生态位互补和能量流动优化,可以避免教育资源的浪费和技能培养的断层,确保中高职教育的无缝衔接。生态因子协同维度则强调中高职贯通教育的成功实施依赖于学校、企业、政府等多元主体的协同合作。这一维度有助于理解如何通过政策支持、资源共享和信息反馈等机制,促进各主体之间的合作,形成“共生效应”,从而提升教育系统的整体效能。通过这两个维度的结合,可以全面解析中高职贯通教育的生态特征,既关注整体结构,又注重内部机制,从而为职业教育的高质量发展提供理论支持和实践指导。

(一)系统整体性维度:构建层级衔接的“教育生态链”

教育生态学强调教育系统是一个由多种要素相互作用、相互依存的有机整体,这些要素包括教育主体、教育环境、教育资源等。^[11]在中高职贯通的背景下,系统整体性维度关注的是中职与高职教育在人才培养、课程设置、资源配置等方面的协同性和一致性,以及如何通过优化这些要素的相互关系,实现整个职业教育系统的高效运行和协调发展。从教育生态学的视角来看,系统整体性要求中高职教育在生态位上

形成互补,在能量流动(资源利用)上实现优化,并在生态系统(教育环境)中保持动态平衡。^[12]这种整体性不仅有助于提高职业教育的质量和效率,还能增强职业教育对社会需求的适应能力。基于以上理论基础,中高职贯通的系统整体性维度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进行解析。

第一,生态位互补机制。中职与高职在职业教育体系中占据不同的生态位,二者在人才培养目标上形成梯度分工,实现生态位的互补。中职教育聚焦于基础技能的养成,主要通过系统的课程设置和实践训练,为学生奠定扎实的职业技能基础。高职教育则侧重于技术创新能力的培养,注重将理论知识与实践技能深度融合,提升学生解决复杂问题的能力。通过课程模块化衔接与生态位互补,中高职教育形成了一个有机的技能发展连续体,避免了技能培养的断层和重复,实现了从基础技能到高级技能的平滑过渡。这种生态位互补机制不仅符合教育生态学中“生态位分化”的原理,还为学生提供了多层次、连续性的发展路径。^[13]从理论角度看,这种分工与衔接符合职业带理论,即技能人才可以分为技术工人、技术员和工程师三个系列,中职主要培养初中级技能人才,高职主要培养高级技能人才,本科层次职业教育培养现场工程师。^[14]这种分层培养模式为中高职贯通提供了理论基础,也为职业教育体系的完善提供了重要支撑。

第二,能量流动优化效应。能量流动优化效应在中高职贯通机制中呈现系统性表征,其内在机理与教育生态系统能量迁移规律深度契合。依据教育生态学理论,能量流显著表现为从教育外部向内部的迁移过程,其中重点学科专项经费、重点实验室建设资金、博士点科研基金以及纵向横向项目投入等外部资源,构成生态系统能量输入的核心源流。当这些能量流进入学校场域后,其分配路径与转化效率成为关键,中高职贯通项目通过“n+n”学制设计,构建了能量传导的优先通道,使外部资源在流入过程中即形成精准定向,有效避免了能量在传统

路径下多层次流转中的耗散。具体而言,该模式通过课程模块的标准化衔接和实训资源的梯度化配置,促使外部能量流在输入初期即完成结构性优化,形成基础技能与进阶技能培养的资源势能差。这种配置方式不仅使能量流在院系、教研室及教学团队间的分配更具靶向性,更通过中高职协同管理实现能量由“径流”向“潜流”转化的路径优化与效率提升。这种能量传导优化既降低了学生时间成本投入与经济负担,又促成教育资源从低阶重复向高阶聚合的质性转变,其本质是通过系统能量流动路径重构,实现教育投入的结构性增效,其内在机理与生态系统能量金字塔规律具有同构性。

(二)生态因子协同维度:多元主体的“共生效应”

在中高职贯通教育体系中,生态因子协同维度是实现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关键。这一维度涵盖了政策支持、资源共享、信息反馈等多个关键要素,这些要素相互作用、协同发展,共同构成了一个有机的教育生态系统。^[15]教育生态系统由多个生态因子(师生、学校、企业、政府等)构成,中高职贯通需通过因子之间的协同实现能量流动与生态平衡。^[16]通过优化这些生态因子之间的关系,可以有效提升中高职贯通教育的整体效能,推动职业教育的内涵式发展。在生态系统理论中,任何一个生态系统的稳定性和可持续性都依赖于其内部各因子的协同运作。

同样,在中高职贯通教育体系中,政策支持、资源共享、信息反馈等生态因子的协同作用,是实现教育系统高效运行和高质量发展的核心。政府出台的一系列政策为职业教育的发展提供了强大动力支持,如通过“职教高考”制度的实施,中职学生的升学渠道得到了显著拓宽,这不仅为中职学生提供了更多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也为职业教育的长远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同时,技能拔尖人才免试升学政策的推行,进一步打通了“中职—高职—本科层次职业教育”的上升通道,激励了更多学生在职业教育领域精耕细作,努力提升自身技能水平。此

外,校企合作是职业教育人才培养的关键环节。企业深度参与人才培养全过程,为学生提供了更加贴近实际工作的学习环境和实践机会。同时,搭建区域职教大数据信息平台,实现了行业技术动态、岗位需求与教学资源的实时同步,这一平台的建立为职业教育的教育教学改革提供了有力支持。同时,职教大数据信息平台也为学校和企业之间的沟通与合作提供了便利,促进了教育资源的优化配置和共享。更重要的是,通过中高职贯通项目,职业教育在文化认同构建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这些举措有助于消除社会对职业教育的偏见,提升了中高职贯通培养的社会认可度和吸引力,为中高职贯通培养项目的持续发展营造了良好的社会氛围。

三、中高职贯通培养项目生态系统失衡表征

中高职贯通培养项目生态平衡的维系涉及多维参数配置,包括师生配比、教职工结构比例(教学/管理/后勤人员分布)、教辅人员配置比、空间资源承载力(在校生规模与绿地、运动场地面积的适配指数)等关键指标。当前,职业教育发展过度追求规模扩张,导致质量保障参数失衡,引发六大结构性矛盾:其一,教育投入增量需求与国民经济支撑能力的适配性矛盾;其二,人才培养输出结构与社会岗位需求矩阵的错位性冲突;其三,人才地域流向与区域经济布局的非耦合现象;其四,传统育人理念与社会文化转型期的价值导向碰撞;其五,精英教育扩张与基础教育根基稳固的资源配置博弈;其六,教育功利化倾向与人文精神培育的本体性冲突。这些参数失衡与矛盾交织,共同构成教育生态系统失衡的复合诱因。^[17]

根据教育生态学原理,中职与高职本应形成“基础技能—技术创新—工程实践”的递进式生态链,但现实中因培养目标错位、课程衔接断层等导致层级间能量传导受阻。这种断裂的本质是系统垂直结构完整性的破坏,属于生态系统骨架层面的失衡;而功能性失调则聚焦于系统水平维度的功能实现障碍。教育生态系统需完

成能量“输入—转化—输出”的功能循环,但现实中存在资源分配梯度差导致的能量转化低效、社会认知偏差等现象,由此又引发出系统输出受阻、产业适配滞后造成的反馈机制失调等问题。这类失调属于生态系统生理机能层面的障碍,影响系统与环境间的物质能量交换。结构性断裂与功能性失调存在交互强化关系,结构性断裂会削弱系统功能承载力(如课程断层降低人才培养质量),功能性失调反过来加剧结构失衡(如资源错配加速生态位重叠)。因此,基于教育生态学理论框架,中高职贯通培养生态系统的失衡表征可解构为结构性断裂与功能性失调两大维度,其内在机理与前期建构的生态系统存在同源性关联。

(一)结构性断裂问题

1. 衔接断层。在现代职业教育体系中,中高职贯通培养模式旨在构建一条畅通无阻的人才培养路径,然而在实际运行过程中,在培养目标、课程设置等方面衔接却出现了明显的断层现象,这严重阻碍了中高职贯通生态的良性发展,对职业教育人才培养质量产生了诸多不利影响。

从培养目标来看,中职与高职教育存在不一致的情况。中职教育通常侧重于培养具备一定专业技能的初级技术工人,其课程设置着重于基础技能的训练与实践操作能力的提升,旨在让学生在较短时间内掌握一门基础实用技能,快速进入职场。^[18]而高职教育则更强调培养具有较高理论水平和较强实践能力的高端技术技能人才,对学生综合素质和知识深度的要求更高。^[19]这种目标上的差异导致中高职课程在衔接时缺乏统一的标准和连贯的规划,使得学生在从中职升入高职后,难以适应高职阶段的学习要求,课程学习出现脱节。

在课程设置方面,内容重复与脱节并存的问题尤为突出。^[20-23]一方面,中高职课程存在大量重复内容。中职和高职相对独立存在,相互之间缺乏有效的沟通和协调机制,导致课程设置各自为政,不系统、不连贯。教学内容更新滞后

与行业需求脱节也是导致课程衔接断层的重要因素。^[24]职业教育的课程内容更新往往滞后于行业需求的变化,导致学生所学知识和技能与实际工作需求存在较大差距。由于缺乏统一的课程更新标准和机制,中职和高职院校各自围绕就业导向、企业标准、岗位需求、产业结构调整和技术水平进步等因素,每年修订人才培养方案和课程标准,但调整后的课程内容仍然存在重复或断层问题,使得人才培养与行业需求的适切性较差,学生毕业后难以适应快速变化的就业市场环境。

在考核评价方式上,单一且缺乏连贯性同样不容忽视。中高职院校在考核评价方式上也存在差异,中职学校可能更注重对学生的实践操作能力和技能水平的考核,而高职院校则更强调对学生的理论知识和综合能力的考核。然而,在中高职贯通培养过程中,这种考核评价方式的差异并未得到很好的协调和统一,导致考核评价缺乏连贯性和系统性。

2. 资源分配存在梯度差。在中高职贯通培养体系中,资源分配梯度差问题日益凸显,成为制约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因素之一。这一问题不仅影响了中高职院校的教育教学质量,也对学生的成长和发展产生了诸多不利影响。

从师资力量来看,中职与高职院校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差距。^[25]高职院校在人才引进上通常能够吸引到更多高学历、高职称的教师,这些教师不仅具备扎实的理论知识,还拥有丰富的实践经验和科研能力。相比之下,中职学校的教师队伍高素质、高学历、高职称教师的占比较小。这种师资力量的梯度差导致中职学生在学习过程中难以获得与高职学生同等质量的教育教学指导,从而影响了学生的学习效果和职业发展。

在教学设施和设备方面,中高职院校之间的差距同样显著。高职院校往往拥有更为先进的教学设施和设备,如现代化的实验室、实训基地等,这些设施和设备能够为学生提供更好的实

践教学条件,帮助学生更好地掌握专业技能。而中职学校的教学设施和设备相对较为陈旧和落后,难以满足学生实践教学的需求。这种教学设施和设备的梯度差使得中职学生在实践操作能力和技能水平的提升上受到限制,与高职学生相比存在较大差距。

在校企合作资源这一关键领域,中职与高职院校之间也存在着一定的差距。高职院校往往能够与更多的企业建立紧密的合作关系,为企业提供更优质的人才培养服务,同时也为学生提供了更多的实习和就业机会。而中职院校在校企合作中往往处于较为被动的地位,企业对中职院校的重视程度相对较低,合作意愿不强。这种校企合作资源的梯度差使得中职学生在实践教学和就业方面面临较大挑战,难以获得与高职学生同等的实践经验和就业机会。

在资金投入方面,投入差异也是导致资源分配梯度差的重要因素之一。高职院校通常能够获得更多的政府财政支持和社会资金投入,这些资金不仅用于改善学校的基础设施和教学条件,还用于支持学校的科研和师资队伍建设。而中职院校所获得的资金投入相对较少,学校的基础设施和教学条件改善缓慢,师资队伍建设和科研能力提升也受到限制,这种资金投入的梯度差进一步加剧了中职与高职院校之间的资源分配不均衡。

(二)功能性失调表现

1. 社会认知偏差。中高职贯通教育作为职业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社会认知偏差已成为制约其功能发挥的关键障碍。这种认知偏差并非孤立存在,而是根植于社会文化、教育传统和现实利益格局中,形成了多维度、多层次的认知错位结构体系。

第一,家庭层面的价值判断偏差。在家庭决策过程中,家长普遍存在着一种“学历分层”的思维定式,这种观念使得家长将中高职贯通培养模式视为一种“次等教育通道”。在他们的观念中,职业教育路径往往是孩子在中考失利后的无奈选择,而非一种主动的、有规划的技术技能人

才成长路径。这种认知偏差导致了家长在教育选择上形成了“二元思维”：一方面，家长将普通教育视为培养“脑力劳动精英”的途径，期望孩子通过这一路径获得更高的学历和更广阔的发展空间；另一方面，家长将职业教育视为培养“体力劳动阶层”的途径，认为这是为那些无法进入普通教育体系的孩子提供的选择。而更深层次的认知偏差则体现在对不同岗位技术技能价值的偏见上，多数城市家庭仍然抱有“白领”岗位社会地位显著高于“蓝领”的观念，这种价值判断直接影响了家长对中高职贯通教育的看法，使其对这一教育模式产生了负面的标签化认知。这种认知不仅影响了家长对职业教育的态度，也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孩子的发展选择，使得职业教育的社会认可度和吸引力受到制约。

第二，政策执行中的符号异化。在政策落地过程中，地方政府存在明显的“指标置换”现象，这一问题在中高职贯通教育领域表现得尤为突出。某些地区教育部门将贯通教育规模的扩张简单等同于中职升学率的提升，这种片面的理解导致了政策执行的偏差。具体而言，中高职贯通项目被异化为学历提升的工具，而其原本应具备的技术技能培养本质被严重弱化。这种执行偏差进一步衍生出新的认知符号，贯通教育被重构为“曲线升本”的跳板。在一些职业技术学院的贯通班中，学生选择“准备专升本考试”的比例极高，这严重偏离了贯通教育的初衷。此外，政策话语体系中的概念混杂进一步加剧了认知混乱。例如，“现代职教体系”“类型教育”等政策概念，在基层实践中被简化为“中职+高职”形式上的叠加，这种简化忽视了贯通教育的内涵和特色，导致其在实际操作中难以发挥应有的作用。这种现象不仅影响了职业教育的质量和吸引力，也制约了技术技能人才的培养和发展。

第三，文化场域中的象征暴力。在社会认知的构建过程中，媒体叙事在无形中构建了隐性的认知框架，这种框架对公众的认知产生了深远的影响。^[26-27]在对“大国工匠”的宣传报道中，

典型案例的选取往往偏向于高学历者，这种象征性示范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无形的认知误导。具体而言，大量报道聚焦于本科及以上学历的工匠，使得公众在潜意识中将高学历与工匠精神画上等号，而忽视了职业教育在培养技术技能人才方面的重要作用，这种现象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公众对职业教育的认知和评价。

第四，网络空间的技术话语权分配存在失衡现象。^[28]在知识分享平台上，职业教育话题的讨论热度远不及普通教育，且部分讨论内容带有戏谑调侃的色彩，该现象不仅反映了社会对职业教育的轻视，也加剧了公众对职业教育的误解。传统文化中的“劳心者治人”观念在当代社会中演变为一种认知过滤器，对公众的认知产生了深远的影响。^[29]具体而言，公众对技术工人的智力评价均值较低，而对办公室职员智力评价则相对较高。^[30]这种认知偏差直接映射到教育选择行为中，导致许多家庭在教育选择时倾向于普通教育，而忽视了职业教育的价值和意义。这种现象不仅影响了职业教育的发展，也制约了技术技能人才的培养和社会经济的进步。

这些交织叠加的认知偏差构成了阻碍中高职贯通教育发展的无形之网，其影响已超越单纯的教育领域，演变为涉及社会流动、人才评价、文化认同的系统性认知困境。每个认知偏差节点都在持续生产着符号暴力，不断重构着社会对技术技能人才的价值判断标准。

2. 产业适配滞后。中高职贯通教育体系作为连接中职与高职的纽带，其核心价值在于通过学制衔接实现人才培养与产业需求的精准对接。然而在实际运行中，产业适配滞后已成为制约该体系效能的症结，具体表现为人才培养与产业转型升级之间出现的结构性错位，这种错位并非简单的技术代际差异，而是系统性的生态失衡。

第一，专业结构滞后于产业迭代周期。职业院校专业设置在适应产业需求方面存在显著的迟滞问题，这一现象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传统审批流程的制约。从产业需求的识别到专业申

报获批,通常存在2—3年的延迟,这种迟滞严重影响了职业教育对新兴产业的响应。此外,专业目录的刚性管理进一步加剧了这一问题。职业院校在调整专业设置时,往往难以迅速响应新兴领域的人才需求。除此以外,部分传统专业由于惯性维持,仍然占据了大量的教学资源,而这些专业对应的产业可能已经进入衰退周期,因此这种教育资源的错配造成了巨大的沉没成本,浪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

第二,校企合作缺乏深度与广度。当前职业教育体系中的校企合作模式虽在教育与产业对接方面有一定成效,但在深度和广度上存在不足。^[31]例如,多数合作项目仅停留在学生顶岗实习、设备捐赠等表层互动,缺乏技术研发、标准制定等关键领域的深度协同,限制了教育与产业的实质性融合,导致职业院校在培养学生实践能力和创新思维方面难以满足产业发展需求。企业提供的实训项目多为重复性基础操作,与真实生产任务的技术含量差距较大,造成学生技能与企业需求脱节,影响其职业竞争力和就业适应性。此外,合作企业中新兴产业主体占比较低,实践教学场景难以反映产业升级的真实情况,职业院校对产业技术变革的敏感度弱化。这种浅层合作模式影响了职业院校教育教学质量,还导致产教信息传递不畅,院校课程设置和教学内容更新滞后于产业发展需求,进一步加剧教育与产业脱节,削弱职业教育对产业发展的支撑作用。

产业适配滞后本质是职业教育系统与产业生态系统动态平衡机制失衡,这不仅造成教育资源结构性浪费,还在产业升级关键期存在职业教育人才供给侧系统性延迟。当职业院校人才培养节奏与产业变革频率差异突破临界点,将引发技术技能人才供应链持续性断裂风险,这种隐性代价比显性就业率指标更需要警惕。

四、中高职贯通培养项目生态平衡优化路径

(一)修复生态链,构建“三位一体”衔接机制

中高职贯通培养作为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重要支柱,其生态系统的良性运行直接关系到

技术技能人才培养质量与社会经济发展需求的适配度。当前该体系面临生态链断裂的困境:课程衔接呈现碎片化,能力培养出现断层化,评价体系存在割裂化,严重制约着职业教育服务产业升级的能力。若要修复这一生态链,需要构建课程目标、能力发展、评价反馈“三位一体”的衔接机制,形成螺旋上升的技能成长通道,实现教育生态的动态平衡。

教育生态链的修复首要环节在于重构课程目标衔接体系。中职与高职作为职业教育生态链的关键节点,本应形成“基础技能—技术进阶—创新应用”的递进关系。但现实中课程模块重复设置、技术深度衔接不足等问题导致生态位重叠。构建课程目标衔接机制,需开发模块化课程衔接包,在中职阶段嵌入高职基础模块,高职阶段设置技术升级模块,形成螺旋上升式技能发展链。课程生态链的修复,既避免了教育资源的重复消耗,又保证了技术技能培养的递进性。

能力发展衔接是生态链修复的核心环节。职业教育生态系统中,能力流动应遵循“基础能力—专项能力—综合能力”的传导路径。但现有培养体系存在能力认证碎片化问题,中职获取的证书与高职培养标准缺乏关联度。建立能力发展衔接机制,需开发贯通式能力图谱,在中职阶段强化基础操作能力认证,高职阶段侧重系统设计与创新能力培养。通过建立跨校际的能力认证中心,实现学分互认与成果转换,确保学生不同教育阶段的能力积累具有连贯性和系统性。这种能力生态链的贯通,既提升了技术技能人才的成长效率,又增强了职业教育体系的整体效能。

评价反馈机制的衔接是生态链修复的保障。传统评价体系中,中职侧重过程性评价,高职强调结果性考核,二者缺乏贯通性反馈渠道。构建评价反馈衔接机制,需建立校企二元评价云平台,在中职阶段引入企业导师参与过程性评价,高职阶段实施“课程作品+企业项目”的综合评价。开发贯通式评价量表,将职业素养、实

践能力和创新表现纳入统一评价框架,形成“评价—反馈—改进”的闭环系统。通过建立中高职贯通项目质量监测中心,定期发布人才培养质量报告,为生态链修复提供数据支撑。这种评价反馈生态链的贯通,既保证了人才培养标准的统一性,又促进了教育质量的持续提升。

修复中高职贯通培养的教育生态链,构建课程目标、能力发展、评价反馈“三位一体”的衔接机制,是破解当前职业教育生态失衡的关键路径。这种系统性改革不仅有助于提升技术技能人才培养质量,更能促进职业教育与产业发展的深度融合,为构建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提供生态保障。

(二)优化资源势能配置,建立精准配置模型

中高职贯通培养项目的良性运行,本质上是教育资源势能转化的过程。当前该体系面临资源分配梯度差显著的困境,这种资源势能的错配,严重制约着职业教育生态系统的平衡发展。优化资源势能配置,建立精准配置模型,成为破解这一困境的关键路径。

构建跨校际资源池是资源势能优化的首要任务。中职与高职作为职业教育生态链的上下游,其资源需求具有显著的阶段性特征。其中,中职阶段需要基础技能实训设备和“双师型”教师,高职阶段则更需要技术升级实训平台和行业专家资源。而建立贯通培养项目专项资源池,将两个阶段资源需求纳入统一管理框架,实施资源需求侧动态监测,则能够精准识别不同阶段、不同专业的资源缺口。以实训基地建设为例,中职可共享高职的虚拟仿真平台,高职应可开放技术创新实验室供中职学生体验,形成“基础共享—高端互补”的资源配置格局。这种资源池的构建与共享,不仅提升了资源利用率,更促进了校际资源的协同进化。

此外,精准配置模型的建立需要开发多维度评估工具。传统资源分配模式往往依赖经验判断,缺乏量化依据,建立“资源需求—供给匹配度”评估模型,能够从专业匹配度、技术先进度、使用效率等维度构建评估指标体系。实施“需

求侧申报—供给侧响应—配置效果反馈”的闭环管理,定期发布资源配置效率报告。以师资配置为例,开发“双师型教师能力雷达图”,从实践能力、教学能力、行业经验等维度评估教师资源,建立教师资源调配云平台,实现优质师资跨校流动。精准配置模型既保证了资源配置的科学性,又提升了资源利用的效能。资源势能转化的关键还在于建立动态调节机制,职业教育生态系统具有动态演化特征,产业升级和技术变革要求资源配置模型持续进化。建立“政府—学校—行业”三方联动的资源配置调节委员会,定期研判行业发展趋势,动态调整资源配置方向。开发资源配置预警系统,当某专业资源需求超过供给阈值时将自动触发调节机制,通过校企共建、政府补贴等方式填补资源缺口。这种动态调节机制,确保了资源势能转化的持续性和有效性。优化资源势能配置,建立精准配置模型,是推动中高职贯通培养项目生态平衡的资源驱动路径。这种改革不仅有助于提升资源的利用效率,更能促进职业教育与产业发展的深度融合,推动中高职贯通培养项目生态系统的可持续发展。

(三)提升项目认可度,重塑认知生态工程

中高职贯通培养项目作为现代职业教育改革的重要探索,其社会认可度的提升是维系生态系统平衡的关键因子。当前该项目面临认知生态失衡的困境:公众普遍存在“职业教育低人一等”的刻板印象,企业招聘时存在学历歧视现象,学生选择贯通项目时存在身份认同焦虑。这种认知偏差导致生源质量波动、校企合作深度不足、政策执行效果打折,严重制约着项目的可持续发展。因此,重构认知生态,提升项目认可度,已成为贯通培养项目突破发展瓶颈的必由之路。

价值传播体系的重构是认知生态重塑的起点。传统职业教育宣传多聚焦就业率等单一指标,难以触动公众对技术技能人才价值的社会认知。构建“技术价值—人才成长—社会贡献”传播框架,通过“三位一体”的融媒体矩阵讲述

中高职贯通培养项目的特色故事。制作“职校生职场成长纪录片”,展现学生从中职到高职的技能进阶轨迹;开展“大国工匠进校园”系列活动,邀请优秀毕业生现场分享职业成就。这种价值传播体系的重构,旨在重塑公众对中高职贯通培养项目的认知,让技术技能成才的价值可视化。

多元主体协同是认知生态重塑的关键。企业作为职业教育成果的需求方,其用人导向直接影响社会认知。编制“企业技术岗位贯通培养需求目录”,引导企业设置“技能型管理岗”“技术型专家岗”等新型职位,为中高职贯通项目毕业生搭建职业晋升通道。推动校企共建“产业学院”,将企业技术标准转化为教学标准,实现教育链与产业链的深度融合。建立“贯通项目人才培养质量反馈联盟”,定期召开校企对话会,将企业的用人反馈转化为教学改革动力。这种多元协同机制,能够形成认知重塑的合力,让职业教育的社会价值可感知。

自我身份认同重塑是认知生态重构的深层目标。中职学生普遍存在“升学焦虑”与“职业认同困惑”并存的矛盾心理,因此实施“职业启蒙教育贯通计划”也很有必要。例如,在中职阶段开设“职业人格发展”课程,在高职阶段开展“职业领导力”培养,构建“职业认知—职业体验—职业规划”的连贯教育体系。建立“贯通项目学生成长档案”,记录学生技能成长、社会实践、创新成果等关键节点,形成可视化的职业发展轨迹。开展“未来工匠成长营”,邀请行业大师指导学生的职业生涯规划,帮助其建立职业自信。这种身份认同的重塑,能够让贯通培养项目的价值内化为学生自我发展的动力。

提升社会认可度与重塑认知生态,是贯通培养项目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战略选择。这需要政府、学校、企业、媒体等多方协同,构建“价值传播—主体协同—身份认同”的三维重塑体系。当技术技能人才的价值被社会广泛认可,当中高职贯通培养项目成为青年成长的重要选择,职业教育生态系统将真正实现良性循环,为产

业升级提供源源不断的人才支撑。

(四)破解产教融合浅层化现象,更新产教融合迭代机制

中高职贯通培养项目作为技术技能人才供给的重要通道,其产教融合深度直接影响着人才培养与产业需求的适配度。当前该项目面临企业参与停留在浅层合作,产业技术更新与教学内容调整存在偏差,校企联合培养缺乏持续迭代机制。这种滞后性导致人才培养与产业需求脱节,制约着职业教育服务产业升级的能力。因此,破解这一困境,需要构建“需求感知—动态响应—迭代优化”的产教融合闭环系统。

精准对接产业需求是学校方主动破解产教融合滞后的前提。建立行业技术发展趋势监测平台,运用大数据技术分析区域产业技术迭代周期,预测技能人才需求变化。开发产教融合指数评估模型,从技术研发参与度、课程更新频率、设备共享率等维度构建评估体系,定期发布产教融合质量报告。以智能制造相关产业领域为例,通过监测工业物联网、数字孪生等技术的产业化进程,动态调整机电专业群的课程设置,确保教学内容与产业技术保持同步。这种精准对接机制,能够缩小校企之间的信息差,为产教融合奠定基础。

迭代优化机制构建是破解产教融合滞后的核心。建立“校企双元育人计划”,将企业生产场景转化为教学项目,形成“真实案例—教学模块—创新实践”的转化链条。开发技术迭代教学包,将产业新技术转化为模块化教学资源,建立教学资源动态更新机制。

生态协同进化是破解产教融合滞后的保障。构建“企业技术导师—学校专业负责人”双轨对话机制,建立定期会商制度,形成“产业需求—教学改革”的联动效应。开发“产教融合生态健康度”诊断系统,从机制创新、资源流动、人才培养等维度评估生态活力,建立预警反馈机制。推动职业教育集团化发展,建立跨校际、跨行业的产教融合资源共享平台,实现三方协同进化,这种协同进化机制为产教融合提供了持续动力。

破解产教融合滞后与更新迭代机制,是中高职贯通培养项目实现生态平衡的生态进化之路。这需要政府建立产教融合政策支持体系,行业企业深化参与机制,职业院校创新人才培养模式,共同构建“需求驱动—机制创新—生态协同”的产教融合新生态。当产教融合成为职业教育与产业发展的双螺旋结构,中高职贯通培养项目将真正实现人才供给与产业需求的动态平衡,为经济转型提供坚实支撑。

参考文献

- [1] 教育部. 2023 年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EB/OL]. (2024-10-24)[2025-02-14]. http://www.moe.gov.cn/jyb_sjzl/sjzl_fztjgb/202410/t20241024_1159002.html.
- [2][4][18] 陈鹏. 长学制人才培养视域下中高职一体化的省域实践:以江苏省为例[J]. 教育与职业, 2023(19): 37-45.
- [3] 于丽娟. 中高职一体化人才培养中的问题分析及发展对策:以浙江省护理专业为例[J]. 中国职业技术教育, 2020(19): 72-77.
- [5][19][20] 古翠凤, 张雅静. 类型教育视角下中高职人才贯通培养的协同机制研究[J]. 职业技术教育, 2022, 43(25): 24-30.
- [6] 涂尔干. 教育思想的演进[M]. 李康, 译.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6: 1.
- [7] 潘懋元, 陈斌. 论作为交叉学科的高等教育学[J]. 高等教育研究, 2021, 42(4): 56-60.
- [8] 克雷明. 公共教育[M]. 宇文利, 译.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6: 20-60.
- [9][10][13][17] 吴鼎福. 教育生态学[M]. 南京: 江苏教育出版社, 1995: 1-3, 94-100, 175, 213-214.
- [11] 朱旭东, 赵瞳瞳. 论促进儿童全面发展的乡村教育生态系统建构:基于“新”教育生态学的理论视角[J]. 清华大学教育研究, 2022, 43(3): 42-50+60.
- [12] 陆韵. 生态视域下学习共同体的内涵、结构与特征[J]. 基础教育研究, 2013(24): 7-8.
- [14] 曾天山, 韩江萍, 徐晔, 等. 中高职贯通培养路径如何优化[N]. 中国教育报, 2024-06-25(6).
- [15] 杨晓宏, 李策, 梁丽, 等. 生态学视域下教师信息化教学模式创新的动力机制[J]. 电化教育研究, 2023, 44(4): 101-109.
- [16] 黄丽静, 杨玉. 高校创新创业教育生态:系统结构、困境与优化[J]. 黑龙江高教研究, 2024, 42(8): 147-153.
- [21] 朱建柳. 基于课程衔接视角的中高职贯通人才培养设计与实践:以汽车服务与营销专业为例[J]. 教育发展研究, 2017, 37(5): 59-63.
- [22] 张秀霞. 中高职贯通课程衔接的现状、策略与保障[J]. 教育与职业, 2016(24): 95-98.
- [23] 赵彤, 钱冰冰. 中高职衔接贯通体系研究[J]. 教育与职业, 2013(32): 25-27.
- [24] 王琴. 中高等职业教育贯通培养模式的制度与实践:以上海为例[J]. 职业技术教育, 2013, 34(13): 50-54.
- [25] 李冲越, 马树超. 中高职教育贯通背景下师资共享的问题与对策[J]. 职教论坛, 2016(35): 10-13.
- [26] 周勇, 倪乐融, 李潇潇. “沉浸式新闻”传播效果的实证研究:基于信息认知、情感感知与态度意向的实验[J]. 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 2018, 40(5): 31-36.
- [27] 喻国明, 曲慧. 媒介认知:社会性偏向及影响性因素研究:基于“全民媒介使用与媒介观调查”的实证分析[J]. 媒体融合新观察, 2020(3): 10-15.
- [28] 刘贵占. 网络空间的权力:技术与话语[J]. 东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5, 17(2): 117-121.
- [29] 杨利民. 对“劳心者治人, 劳力者治于人”的再认识[J]. 甘肃社会科学, 1994(5): 32-34.
- [30] 张悦, 汪继彬. 教育家精神融入“大国工匠”培养的逻辑证成与实现方略[J]. 职教发展研究, 2025(1): 95-102.
- [31] 王新国, 陈向阳. 现代化产业体系下职教资源与产业布局匹配的价值、困境与方略:以江苏为例[J]. 中国职业技术教育, 2024(34): 3-9+26.

基金项目:江苏省 2024 年研究生科研与实践创新计划“中高职贯通培养项目的民众吸引力研究——基于网络民族志的方法”(项目编号:KYCX24_3004)。

Systematic Construction and Optimization Pathways for the Integration Mechanism between Secondary and Higher Vocational Educ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ducational Ecology

Zhu Changjiang, Chen Peng

Abstract: The integration mechanism between secondary and higher vocational education aims to forge an ecological community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characterized by self-organization and self-adaptation, thereby facilitating the in-depth integration of education and industry and cultivating high-caliber technical and skilled personnel who can meet the demands of socio-economic development. Nevertheless, the current integrated cultivation of secondary and higher vocational education is confronted with a host of issues, including curriculum discontinuity, resource allocation disparities, social perception biases, and lagging industry adaptation, all of which have severely undermined the quality and efficacy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This paper meticulously analyzes the constituent elements and their interrelationships within the integrated cultivation system of secondary and higher vocational education from both macro and micro perspectives. Furthermore, it proposes optimization pathways for the ecological equilibrium of integrated cultivation projects in this realm, encompassing ecological chain restoration, resource potential allocation, enhancing project recognition, and updating the iterative mechanism for industry-education integration. The construction and development of the integration mechanism between secondary and higher vocational education necessitate breaking through existing ecological barriers, establishing an evolutionary model for the educational ecosystem, and propelling the ecological transformation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from "scale expansion" to "quality symbiosis". Simultaneously, it is imperative to achieve the co-evolution of the educational ecosystem and the industrial ecosystem to nurture a greater number of high-caliber technical and skilled personnel for socio-economic development.

Keywords: Integrated Cultivation of Secondary and Higher Vocational Education; Educational Ecology; Educational Ecological Chain; Vocational Education

(责任编辑 邱梅生 见习编辑 潘懿璐)